

清代上海城隍庙的公共化转型与邑庙园林之兴起



闫爱宾*, 魏海宁

华东理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景观规划设计系, 上海 200237

摘要: 清康乾时期, 日益发达的商业与手工业催化了上海城镇的迅速崛起与人口的激增, 乡绅群体也因之随着商会组织活跃与人口快速流动而进一步壮大, 并积极介入城镇公共事务的管理之中。与此同时, 自明初确定的带有官方性质的城隍信仰随着时代变迁不断下沉, 在这一时期已全面民间化与世俗化, 其娱神娱人以及公平审判的意味早已盖过明代庄严的国祭功能。论文聚焦于上海城隍庙公共化转型与邑庙园林之兴起, 揭示清中后期地方政府对城隍庙维护与管理的荒疏如何催生了乡绅群体与普通邑民的积极介入, 并逐步成为推动 18 世纪上海城隍庙及附属邑庙园林兴盛的活动主体, 以及邑庙园林如何逐步转变为当地邑民的公共活动空间与经济活动场所, 豫园、秋霞圃、曲水园、古猗园相继成为各府、县城隍庙的附属园林的进程, 并联系其历史背景探究上述古典园林转变为邑庙园林的成因。

关键词: 上海; 清代; 城隍庙; 邑庙园林; 公共化

DOI: [10.57237/j.ssrif.2024.03.001](https://doi.org/10.57237/j.ssrif.2024.03.001)

The Transition to Publicization of Chenghuang Temple and the Rise of Affiliated Gardens in Shanghai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ibin Yan*, Haining Wei

Department of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School of Art Design and Media,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Qing Kangxi and Qianlong periods, the burgeoning commerce and handicraft industries catalyzed the rapid rise of urb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growth in Shanghai. The gentry class, with the increasing activity of commercial organizations and rapid population movement, further expanded and actively engaged in the management of urban public affairs. Meanwhile, the official cult of the City God, established since the Ming Dynasty, continued to evolve with the changing times. By this period, it had completely transitioned into folk and secular practices, with its significance in entertaining gods and people, as well as ensuring fair trials, overshadowing its solemn national sacrificial functions from the Ming Dynasty.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江南园林论”(编号 17WYS003);

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式与度: 江南传统园林弹性景观控制方法及当代应用研究”(编号 2020PJC021).

*通信作者: 闫爱宾, yanai@126.com

收稿日期: 2024-04-28; 接受日期: 2024-05-17; 在线出版日期: 2024-05-20

<http://www.socscires.com>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ublic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the City God Temple in Shanghai and the emergence of suburban temple gardens. It reveals how the neglect of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of City God temples by local governments in the mid-to-late Qing dynasty spurred the active involvement of the gentry class and ordinary townsfolk. They gradually became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flourishing of City God temples and affiliated suburban temple gardens in 18th-century Shanghai. These temple gardens gradually transformed into public spaces for local residents' activities and economic endeavors. Yuyuan, Qiuxiapu, Qushuiyuan, and Guyi Garden successively became affiliated gardens of City God temples in various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This paper also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behi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se classical gardens into suburban temple gardens.

Keywords: Shanghai; Qing Dynasty; Chenghuang Temple; The Affiliated Gardens of Chenghuang Temple; Publicization

1 引言

邑庙园林特指城隍庙的附属园林，属于传统宗教寺庙及其附属园林的典型组合之一。自明代国家祭典确立城隍庙的举国祭祀体制后，城隍庙是中国唯一一类在城市中建立的神庙，也是由皇帝颁布诏令规定县级以上城市必须建造的庙宇。这使其与城市发展、城市经济、城市居民之间形成了密切关联，也彰显出城隍信仰的特殊性。城隍庙不是城市可有可无的附着物，而是城市居民的精神家园，深刻影响着城市肌理，并成为城市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随着清代中期城隍信仰进一步深入人心，城隍庙与城市居民的关系日益紧密，在上海则兴起了为城隍神建园林的风潮。不少私家园林陆续被地方人士主动募购后捐给城隍庙作为灵苑，同时也完成了从私家园林向邑庙园林的变迁；这种自发性行为是清中叶上海邑庙园林形成的直接因素。有关于这一自发行对城市发展的深层影响，目前学界的关注与研究深度尚显不足。

2 募购募建庙园的起因分析

2.1 城隍政治：从政府主导走向民间主导

明代初期，朱元璋革去各地城隍封号，庙中只许供奉社神，不许出现其他神像，以期将城隍庙改造成符合儒家理念的官方教化场所。这一时期城隍庙处于官府控制之下，普通市民进入庙中举行祭祀的活动受限，而地方官员拥有在城隍庙祭祀、借住的特权。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城隍神在地方官员的施政

体系中有着显著的地位，它与官员构成“阴阳表里”的关系，共同管理着地方社会。明代典制规定，地方官员到任后首先要拜谒城隍神灵。《吴县城隍庙记》记载：“国制：有司下车宿庙誓词，而后受事”，此外还需进献祝辞：“某奉命来官，特与神誓，神率幽冥，阴阳表里，予有政务未备，希神默佑，使我政务兴举，以安黎庶；予倘怠政奸贪，陷害僚属，凌虐下民，神其降殃”；此制度在明初纳入典制，且每月初一和十五举行官方祭祀。部分学者认为此时城隍庙与民众存在一定的距离，官方的闲置和明后期的荒政，客观上会形成信仰空间的空置[1]。因此日后存在民众加以填补的可能性。

清代行政体系中州县是一个省的最小行政单元，州县以下再也没有任何类型的正式管理机构。清末，如“同治七年（1868）礼部饬知，城隍祀列地祇，并非人鬼，嗣后不得称公侯伯爵等字样，以重祀典”[2]。对于这样的旨意，尽管官修志书认为“今府境城隍神皆有此称，允宜遵改”，但大多也只流于纸面文章。面对城隍神的世俗化，个别官修志书在是否将城隍神纳入国家祀典神灵这一点上产生了游移。同治年间《上海县志》便将城隍祭祀归入了“私祀”。“私祀”即不符合官方的祭祀活动，属于民间自发行[3]。这一描述间接反映民间自发的城隍祭祀活动，存在影响力盖过官方活动的可能性，以至于官方对举行城隍祭典的定性在不同时期产生偏差。

学者赵世瑜认为：“城隍庙是正祀……官绅按照规定的仪式进行祭祀，就符合礼，百姓在这里搞的宗教实践活动（游神）逾礼越分，使它实际上成为‘淫祀’

(即“私祀”),但在制度上它还是正祀”[4]。乡绅邑人举行城隍活动时,向官府求取“印簿”,即官方的户籍账册,用以募集捐款重修后殿等诸项事宜。虽从制度而言,庙宇使用及修缮仍属于官方管辖范畴,但此时活动筹办已然是民间主导。

2.2 城隍经济:上海松江、嘉定的繁荣与城镇崛起

2.2.1 松江、嘉定商品经济的繁荣

明中叶以后,松江成为全国最大的棉花生产基地;清代前期,上海地区成为江南地区手工业贸易商品的转运中心,亦是东南沿海重要的粮食转运中心。这些沙船在上海地区装载货物,如棉花、土布、茶叶、瓷器和百货等,驶往北洋,在山东、直隶、奉天各口岸卸运售卖,然后又装载关东、山东等地的大豆、豆饼、杂粮、梨枣等土货返回上海。

据统计,康熙二十九年(1690)江海关(上海海关的旧称)的税收为23016.33银两,康熙三十年(1691)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的67年时间里,年均税银60099.3两,后者是前者的2.6倍,乾隆十八年更达到77509银两[5]。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上海城隍庙的公共化转型与邑庙园林的大量兴造亦应时而起。

2.2.2 城镇崛起与镇城隍的兴盛

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造就了一批新兴城镇的崛起,这些城镇多在县治之下。如以米业闻名的青浦朱家角镇、松江枫泾镇和吴江盛泽镇等。城镇化快速发展带来人口的快速膨胀,其规模甚至有赶超县城之势,而县城的财政反过来又多依赖这些城镇“经济大户”[6]。地方收入的跃迁也促进了市镇群体自我认同感的扩张,其中一个显著现象即为镇城隍的兴起。

从市镇的兴起与镇城隍形成的时间来看,二者之间存在很大一致性[7]。仅以青浦县为例,光绪版《青浦县志》中,增加了白鹤江镇、章堰镇、商塌镇三处城隍庙[8],而到了民国版的《青浦县续志》中,更是增加了小蒸镇、金家桥镇、古塘村镇等十七处乡镇城隍庙[9]。由此也形成了完整的城隍庙等级制度:东岳是城隍中的高位城隍,每年州县以及乡镇的地方城隍庙都会举行仪式参拜高位城隍。城隍的等级依次按照

首都—省府—州县各级行政序列设立,在其下还有镇城隍。在此过程中,市镇寻求着国家权威的认同,“希望把自己置位于首都—省府—州县各级行政序列的下层”[10]。这也反映出,即使后期城隍庙世俗化愈演愈烈,但城隍信仰初始的意识形态控制的影响仍然存在,大量信众自发性地融入整个城隍行政序列下层的行为,也愈发强化其主流世俗信仰体系,此时的世俗化反而是对政府意识形态控制的反哺。

2.2.3 “解钱粮”的出现与镇城隍的出现

江南地区在民间信仰上的反映,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解钱粮”习俗的普遍盛行。这一习俗主要表现为当地县或镇等上级城隍庙举办庙会时,乡村城隍要前来参拜并象征性地交纳阴间使用的纸钱。这一习俗,主要围绕着阴历三月二十八日东岳诞辰展开,人们举行各种巡游活动,带领四面八方的乡村城隍向东岳庙集中解纳纸币等物。滨岛敦俊最早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并加以研究。他认为解钱粮及镇城隍等现象的出现,实际是小农被卷入商品经济后,社会生活范围的扩大在宗教上的反映[10]。小农阶层大面积卷入商品经济,既助推了镇城隍的兴盛,又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城隍信仰逐步转型。城隍的公共空间与商品经济活动、行会组织的关系日益密切。这为后来行业公所等行会组织介入城隍庙修缮维护、邑庙园林管理乃至使用埋下了伏笔。

2.3 城隍运营:地方乡绅与城隍产业

2.3.1 城隍庙修缮由政府向邑民的逐渐转变

明代前中期,城隍庙修缮资金要么来源于地方官员的多方“措置”,要么主要来源于县令及其下属的捐款,“民无与焉”是当时的状态。这样的情形到明代后期开始发生变化,万历年间,据称为“澄江世家”的当地士人孔朴私人自发修缮城隍庙,“有事庙下,睹而恻之,修复之念勃,弗可遏,乃独捐帑中缗若干,聚美材,纠良工……”[8],独自完成了城隍庙的修缮。清代类似的行为更为普遍。康熙(1661-1722)末年,高淳县城隍庙修建时,邑中人士“慨然欲起而修之”,遂“请于前令蜀南赵侯,随亲书疏序,发牒议捐,一邑人士云集响应”[11]。当士绅、商人、富户、图长、牙伶

等各个阶层都与城隍庙的修葺发生关联时，其宗教意义及多重功能不言而喻。庙宇修缮在地方失责的语境下，反而达成了社会各阶层修缮的共同认知。

2.3.2 城隍运营：城隍管理的日益组织化

围绕着城隍庙中诸多细务，从明末至清光绪年间，各地陆续形成会社。会社负责管理城隍事务，各有所司且多置有田地产业。例如，高淳县形成了二十多个会社，大殿盘香会“始于乾隆年间（1736-1795），置有田六亩有零，会共二十一人，分四班值事，供应常年香火之费”[11]。值得注意的是，神会的成员基本是当地望族与富商，且大部分与商帮联系紧密。这一现象清晰映射出城隍庙信仰的日益世俗化及其与商业经济活动的紧密结合关系。

2.3.3 城隍经济组织：城隍会

作为城隍信仰组织的董事与城隍会，尤其是后者，他们不仅因为在官方记录中作为户主而拥有法人产权，还因为管理组织的财产而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经济利益的驱动往往也是乡绅热衷于城隍庙修缮、管理等诸项事务的起因。与官府关系密切的乡绅，在官员劝捐时，通常会临时筹集银钱，迅速用于城隍庙的修建等事项。此时的“商”与“绅”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有合流的倾向[12]。而城隍会扮演的角色类似于地域开发和市场组织委员会，已有相对清晰的责任与管辖范围。确定的管辖范围对地方庙宇的生存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明清时期各地方一镇多庙以及庙界冲突的原由之一。固定的区域才会形成固定的庙会，从而产生稳定的土地收益。

梳理康乾时期上海几所邑庙园林与城隍庙之关系，除上海府城隍庙内园、青浦城隍庙灵苑曲水园是城隍庙新建园林外，大多邑庙园林皆为城隍庙相邻的私家园林，经改造后作为邑庙园林使用，而增添灵苑的事项基本都由当时的城隍庙董事以及城隍庙信众发起。

2.4 城隍信仰：从社神走向多元神灵

如上文中提到的，明初城隍庙只允许供奉土地神。明中后期开始，除官方认定的城隍神外，城隍庙还祭祀着几乎所有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民间神灵，如财神、土地神、药神、灶神等。这些多元化的神灵也并

非一成不变。例如，清中叶的上海邑庙园林中还纷纷增添有关十二花神的花神殿。这些多元化神灵的存在，使得民众在城隍庙内可以为生活的各个方面找到祈祷的对象，这种大众化祭祀对象的集合，极大地促进了城隍庙在市民阶层中的影响力，市民和乡绅对于城隍庙的募捐也显得合情合理。

2.5 城隍场所：公共空间与公权力雏形

滨岛敦俊在研究中以赋税征收为例，从明代后期开始，江南地区的城隍庙逐渐成为“士民公议”的场所[13, 14]。万历年间嘉兴县发生的嵌田事件，便是由地方官员多次召集士绅在城隍庙中展开讨论，最终才得以解决的。城隍神是与地方官员“阴阳表里”相互对应的政治形象，负责管理本地区的阴间神灵。在地方官员无法公正、有效处理地方事务时，城隍神公正无欺的形象便被民众有意或无意的利用与强化。部分地区甚至催生在城隍庙审“阴状”的现象。在理念上被赋予与地方官员共理一方水土职责的城隍神，越来越在现实社会中与官方施政行为产生了实际的关联。城隍庙作为神灵的栖息之地，也被彻底整合进地方官员的施政体系中，承担起诸如教化民众、播散信息、沟通士庶等维持地方秩序的政治教化功能。

3 上海邑庙园林之兴起

3.1 上海各城隍庙附属园林的兴起

3.1.1 豫园与上海城隍庙

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上海县乡绅出资购豫园东侧土地，为县城隍庙建造了灵苑，这是上海城隍庙建立三百年以来的首个庙园。乾隆二十五年（1760），当地乡绅又集资购得豫园，并大体上依照原来的布局进行修复与重建，前后历时二十四年，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方始完工。园成后交城隍庙管理，成为其第二个庙园。“两者逐渐融入城隍庙，使得城隍庙及其周边地区在清代前中期发展成为一个公共场所”[15]。

段建强学者认为，在清末至近代豫园园林公共化后，豫园作为上海城隍庙乃至上海县城的城市“公园”性质[16]，几近成为民间共识。

3.1.2 青浦曲水园与青浦城隍庙

曲水园始建于清乾隆十年（1745），最初是作为青

浦县城隍庙灵苑而建。据称为建此园，地方乡绅曾向城中每个居民征募一文钱，故称“一文园”。此后随着乡镇城隍庙的兴起，朱家角镇城隍庙虽扮演着别庙或行宫的角色，但在功能上替代了青浦县城隍庙，呈现出一定的地方特殊性。这一时期，以朱家角镇城隍庙为代表的乡镇城隍庙开始兴起，这在江南地区尤为普遍[17]。此时的镇城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县城隍庙及曲水园的影响力构成了冲击。

3.1.3 秋霞圃与嘉定城隍庙

雍正四年（1726），徽州盐商汪伦将他在嘉定县城隍庙西侧购得的私家园林龚氏园，捐赠给城隍庙作为庙园，即今天的秋霞圃西南部。乾隆二十四年（1736年），乡绅沈氏将其私家园林捐赠给城隍庙，与原有庙园合并，增建了即山亭、迎霞阁、碧光亭、池上草堂、醉月轩、花神殿等建筑，使庙园面积从4.92亩扩大至20余亩。此后数十年间，庙园景观逐渐完善，保持繁荣状态。据1848年《中国丛报》第17卷记载[18]，西方传教徒到达嘉定，考察选择城隍庙张贴传道公告，皆遇到了大量百姓围观，可见此处仍是清末公共宣传的最佳地点。咸丰十年至同治元年（1860-1862），太平军、清军以及洋枪队在县城展开了多次激烈战斗，导致邑庙后园和金氏园遭受严重破坏。光绪二年（1876）重建池上草堂，光绪十二年建丛桂轩，继而建延绿轩，景色逐步恢复。随后地方乡绅又在园中增设茶肆书场，庙中戏台时有地方戏演出，邑庙园林恢复成为县城民众娱乐活动的主要公共空间。

3.1.4 古漪园与南翔镇城隍庙

古漪园由徽籍士人闵姓在明嘉靖初年（1522-1526）新建，位于南翔镇城隍庙之北。初名借园，即暗合其离乡寓寄此地之意，又有向自然借得一园之意。下掘湖池，堆土成山，构成以池为中心、舟阁相对、山水相依的景观。万历后期，闵士藉聘请嘉定竹刻大家朱三松改造设计，增设泛春渠，构建了“有水一池，有竹千竿”的园林布局，使庭园达到了“十亩之园，五亩之宅”的规模。清乾隆十一年，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洞庭山人叶锦购得此园后大兴土木，庭园的面积扩大至27亩，并更名为古猗园。商帮会馆新建园林蔚然成风，洞庭山人即为洞庭东山商帮的别称，亦为苏商主体帮派[19]。

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南翔“地方人士”募捐古

猗园大部分区域，捐给州城隍庙作为灵苑，称“古漪园”，由州城隍庙道士管理，向商绅、香客开放。期间，园内募建花神庙，塑花神像。此后，“古漪园”、“猗园”、“古猗园”之名并用。此处园名变更有多种猜测：一说猗字加水是为了强调城隍庙的放生池效果；一说改为漪是与乾隆皇家园林清漪园的文化互鉴[20]。两者说法皆缺乏较为有力的证据，但仍能侧面反映出邑庙园林时期园林改名一事与其产权变更紧密相连。

3.2 各邑庙园林之对比分析

对上述各城隍庙及邑庙园林对比分析可知：

- 1) 各州县城隍庙的附属邑庙园林，募捐人士多为乡绅和邑民。州县下属的乡镇，通过自发募捐邑庙园林给上级城隍庙的行为，完成了城隍信仰体系上的空间依附。如南翔镇通过募捐秋霞圃，完成对于嘉定城隍庙行宫角色的塑造。
- 2) 州城隍庙成园时间或募捐捐赠时间大多在康乾早期。作为镇城隍庙附属园林的古猗园，在乾隆晚期改为庙园，晚于其他邑庙园林。推测其缘由应是镇城隍庙的扩建活动略晚于州城隍庙。
- 3) 根据秋霞圃、豫园和古猗园的记载，邑庙园林的募捐修建通常伴随着城隍庙建筑的扩充，此时风行的花神庙尤为显著，扩建之后的邑庙园林中普遍存在花神庙的踪影。

4 结语

综上所述，明中后期以降，城隍神逐渐成为更多士绅民众所崇信的对象。随着地方官员对城隍庙事务责任感的减弱，加上地方政府经费受限，城隍庙的修缮与管理也更多地依赖于民间社会。随着康乾时期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海运经济以及手工业的扩张，这一时期上海的镇城隍发展迅速且管理运营逐渐组织化，其理事者也多为当地乡绅与邑民，从而形成上海各州县、镇城隍的完整序列体系，以及与之匹配的城隍庙管理的董事与城隍会，推动城隍庙的建设、管理等各项活动。为了谋求城镇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满足百姓世俗信仰需求，乡绅与邑民纷纷募捐购买园林，扩大庙园规模。他们将多个城隍庙附近的私家园林改建为公共庙园，以满足发展需求，获得更多的

服务于城隍庙的公共空间。这一时代风潮客观上形成了上海地区城隍庙与邑庙园林的相辅相成的空间发展格局。这种格局推动了私家园林向公共园林的转变，同时也为园林的维修、保护提供了经济保障和促进作用。清代上海城隍庙的公共化转型亦是豫园、秋霞圃、古猗园等私家园林存续至今的重要因素之一。

参考文献

- [1] 王健. 官民共享空间的形成: 明清江南的城隍庙与城市社会 [J]. 史学月刊, 2011(7): 57-66.
- [2] 博润等修, 姚光发等纂. 光绪松江府续志 [M]. 卷十. 建置志. 光绪九年 (1883) 刊本: 12.
- [3] 同治上海县志 [M]. 卷十. 祠祀. 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 台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83 年影印本.
- [4] 赵世瑜. 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70.
- [5] 廖声丰. 清代前期江海关的商品流通与上海经济的发展 [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08, (05): 11-17.
- [6] 王隼. 上海庙园场景转换与空间变迁研究——以青浦城隍庙与曲水园的庙园关系为例 [D]. 同济大学, 2008.
- [7] 王健. 明清以来江南民间信仰中的庙界: 以苏、松为中心 [J]. 中国高等学校学术文摘·历史学, 2009, 4(4): 537-578.
- [8] 陈其元等修, 熊其英等纂. 青浦县志 [M]. 清光绪五年 (1879) 刻本.
- [9] 张仁静修. 钱崇威纂. 金咏榴续纂. 青浦县续志 [M]. 民国二十三年 (1934) 课本.
- [10] 申浩. 明清民间信仰视域中的江南社会 [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34(2): 66-70.
- [11] 刘玉堂, 张帅奇. 国家在场、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以明清江南城隍庙为中心的历史透视 [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38(01): 107-115+2.
- [12] 房伟奇. 自治治理视角下乡绅阶层与乡村治理 [D]. 华东师范大学, 2022.
<https://doi.org/10.27149/d.cnki.ghdsu.2022.001471>
- [13] 滨岛敦俊著, 沈中琦译. 明清江南城隍考——商品经济的发达与农民信仰 [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1, 1: 39-49.
- [14] 滨岛敦俊. 旧中国江南三角洲的聚落与社区 [J]. 历史地理. 第 10 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 [15] 王健. 略论清代前中期上海地区府县城市的变迁 [J]. 传统中国研究集刊, 2021, (Z1): 106-115.
- [16] 段建强, 张桦. 城园互动: 上海近现代城市化中公共园林转型机制研究 [J]. 风景园林, 2021, 28(06): 38-43.
<https://doi.org/10.14085/j.fjyl.2021.06.0038.06>
- [17] 李浩. 明以降青浦城隍庙、附园与城市的互动建构研究 [D]. 华东理工大学, 2023.
- [18] 庄新. 《中国丛报》视野下的清代上海 [J]. 文史天地, 2023(04): 38-42.
- [19] 范金民. 明清时期大运河沿线地域商帮的活动 [J]. 经济社会史评论, 2023(03): 4-20+127.
- [20] 亓明曼. 从私园到公园: 近代上海古典园林异化的动力机制探析——以古猗园为例 [J]. 园林, 2018(z1): 44-48.